

● 中国古代文学

略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功用*

崔 际 银

(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河北 石家庄 050091)

[作者简介] 崔际银(1957-)男,河北正定人,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,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,主要从事唐代诗歌、小说研究。

[摘 要] 唐人小说接受诗歌,是就小说运用诗歌的现象而言。小说接受诗歌的功用主要是:保存大量诗歌、演绎诗歌本事、解决诗歌研究中的问题。深入分析这些功用,既有利于增进对相关诗人、诗作的理解,也对拓展小说、诗歌研究领域,具有借鉴、启发意义。

[关键词] 唐人小说;诗歌;接受;功用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14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3)03-0335-07

唐人小说之中拥有数量可观的诗歌。从文体学角度而言(小说与诗歌属于不同文体),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为小说对诗歌的“接受”。狭义的接受,特指小说对诗歌作品的引入;广义的接受,则包括小说中与诗相关的因素,如对诗本事、诗人品性、诗人交往、诗歌发表与流播的记述评价等等。站在广义的立场,考察归纳这种接受所具有的多方面重要价值与功用,是本文的基本用意和主要目标。

一、保存大量诗歌

唐人好诗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诗歌得以流传、保存。为此,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(唐人小说中载有“题壁”、“勒石”、“封瓶漂流”等方式)。著名诗人中最具保存作品意识的是白居易,他亲手整理自己的作品,采取种种措施,为保存自己的著作可谓煞费苦心。但即使如此,也无法确保安全。对于多数名声不大、财力不够的文人来说,很难将自己的作品通过抄写分藏、刻壁勒石之类的形式保存。即使勉力为之,传之久远的可能性也极其微小。相比而言,小说中掺入诗歌,是一种相当不错的保存方式。因为,小说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,易于记诵和流传。唐人小说中保存诗歌的总数,限于种种原因,难以得出准确的答案。不过,笔者曾对《全唐五代小说》作过粗略统计:在其正、外编所收两千余篇小说中,包括近千首诗歌。由此不难做出合理的推论:因小说得以保存的诗歌数量是十分惊人的。在此,我们拟以目力所及的唐人小说为据,对其保存诗歌情况作些说明。

(一)保存小说作家的诗歌。唐代小说作家人数很多,并且来自多种阶层。但是,能够在官修正史、诗文总集中留名传后者,却是寥寥无几。例如,《全唐五代小说》所收作家,其作品中有诗歌者共 86 人次(包括佚名者 14 人次)。新、旧《唐书》为之立传者,不过张说、韩愈、元稹、牛僧孺、温庭筠等 15 人左右,这中间还包括附于他人传文之后者(如张说、张读均附于《张荐传》,段成式附于《段文昌传》)。《全唐诗》号称完备,但上述 80 余人中,只有 30 人左右以本名录入。另外 40 余位小说家兼诗人(扣除佚名者),其

姓名不见于《全唐诗》。我们试举几例:

李朝威《柳毅传》,有诗三首。王洙《东阳夜怪录》,有诗14首。陈劭《通幽记》(《传奇志怪集》),“赵旭”条,有诗一首;“妙女”条,有诗二句;“武丘寺”条,有诗三首;“陆凭”条,有诗一首;“薛二娘”条,有诗一首。薛渔思《河东记》(《传奇志怪集》),“慈恩塔院女仙”条,有诗二首;“吕群”条,有诗二首;“韩弇”条,有诗一首;“成叔弁”条,有联句诗;“韦齐休”条,有诗二首;“段何”条,有诗一首;“申屠澄”条,有诗二首;“卢从事”条,有诗一首。李玫《纂异记》(《传奇集》),“杨祯”条,有诗三首;“韦鲍生妓”条,有诗四首;“许生”条,有诗八首;“陈季卿”条,有诗五首;“嵩岳嫁女”条,有诗12首;“刘景复”条,有诗一首;“张生”条,有诗六首;“蒋琛”条,有诗11首。柳祥《潇湘录》(《传奇志怪集》),“张珽”条,有诗一首;“焦封”条,有诗四诗;“安凤”条,有诗二首;“孟氏”条,有诗三首;“嵩山老僧”条,有诗一首。沈汾《续仙传》(《传奇志怪集》),“蓝采和”条,有诗一首;“许碯”条,有诗一首;“戚逍遥”条,有诗一首;“许宣平”条,有诗四首;“刘商”条,有诗一首;“徐钧者”条,有诗一首;“殷文祥”条,有诗一首;“谭峭”条,有诗一首;“羊愔”条,有诗一首。

此外还有郑还古(《博异志》)、李复言(《续玄怪录》)、皇甫枚(《三水小牍》)等等,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。当然,他们所作小说中的诗歌,大多已被《全唐诗》所收。然而,所属乃是作品中人物之名(包括各种神仙妖怪)。毫无疑问,这些诗歌都是小说作者所创作。他们既是小说家,又是诗人,某些诗歌堪称佳作。这些诗及他们的姓名,是依靠小说而流传至今的。

(二)保存若干社会名士的诗歌。在唐代,有的人或在政界居于权要、或在文坛身为领袖,青史留名、文集传世并非难事,但他们也热衷创作小说,喜欢在小说中运用诗歌。比如韩愈的传奇小说《石鼎联句诗序》,虚设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、侯喜联句作诗的场景,突出了轩辕弥明的与众不同。轩辕弥明通过评诗(“子诗如是而已乎”)、论诗(“不用意而功益奇”)、联句(以诗争斗),使得对方甘拜下风,而他却说这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云云,其用意是表达韩愈对当时浅俗诗风的不满。可以说,这篇小说与后附的联句诗,是韩愈诗歌创作主张、创作实践的展示,属于逞才扬己之作。如果这样的作品堂而皇之地署上己名,似乎有张狂自炫之嫌,而托之以不登大雅的小说之形式,子虚乌有的轩辕弥明之姓名,则变得合情合理。于是,他的这首奇诗也就得以保存。

牛僧孺位至宰相,贵为国公,却非常喜欢传奇小说,亲自创作了小说集《玄怪录》,其中含有诗歌的篇目不少。例如《元无有》中的四位诗人,乃是故杵、灯台、水桶、破铛。他们以联句方式,自报家门、自述功用,颇有谜语诗的味道。与此相类者还有《滕庭俊》中麻大(秃帚)、和且耶(大苍蝇)之诗:“自与慎终邻,馨香遂满身。无关好清净,又用去灰尘。”“冬日每去依烟火,春至还归养子孙。曾向苻王笔端坐,迩来求食浑家门。”不过,《玄怪录》中的诗歌,并非尽皆粗陋,也有若干可读之章:“露接朝阳生,海波翻水晶。玉楼瞰寥廓,天地相照明。此时下棲止,投迹依旧楹。顾余复何忝,日侍群仙行。”这是《柳归舜》中鹦鹉仙子凤花台所吟之诗。“风软景和丽,异花馥林塘。登高一怅望,信美非吾乡。”这是《张左》中薛君曹在“兜玄国”所作怀乡之辞。只是《玄怪录》中这样的作品较少,多为率尔浅俗之作。我们推测,牛僧孺大概不会将这样的诗作,正式地录入自己的诗集。

如果说韩愈《石鼎联句诗序》的联句诗属于“逞才”,牛僧孺的诗歌则意在“游戏”。这与他身为高官在参政之暇寻求放松的心态,是十分吻合的。与韩愈相同的是,他也借此使诗歌得以保存(或许他们的本意并非托赖小说,而事实如此)。

(三)保存下层人士诗歌。唐代小说作家喜欢以传记的形式记述诗文作家及赋诗为文之事,这对知名人士而言,或许无足轻重,而对普通人或身为下贱者而言,则成为存诗传世的惟一机会。

有的因小说留下了完整的诗歌及生平事略。例如:《北梦琐言》卷九,“江淮间有徐月英,名倡也。其送人诗云:‘惆怅人间事久违,两人同去一人归。生憎平望亭前水,忍照鸳鸯相背飞。’亦有诗集。”此诗被收入《全唐诗》(卷八百二),题为《送人》,题下作者小传云:“徐月英,江淮间妓也,有集行世。”显系来自小说。《全唐诗》(卷八百二)收颜令宾诗《临终召客》:“气余三五喘,花剩两三枝。话别一尊酒,相邀无后期。”诗前有长篇序言,叙颜氏身为南曲之妓,爱好诗歌,喜与文士交往,临终求人作诗以为挽词,文士多

应约而作云云。此诗出自《北里志》“颜令宾”条,序言则据此中所记故事节略而成。黄崇嘏是古代著名才女,《全唐诗》(卷七百九十九)录其《下狱贡诗》及《辞蜀相妻女诗》(一作《辞婚》)。然而,如果不是得益于金利用《玉溪编事》“黄崇嘏”条的纪述(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六七),恐怕其人其事其诗均难以留存。普通女子及歌妓如此,贵族妇人也不例外。王韞秀是肃、代两朝宰相元载之妻。她曾作诗三首,一述穷困时与丈夫入京应举:“路扫饥寒迹,天哀志气人。休零离别泪,携手西入秦”(《同夫游秦》);一抒丈夫入相后对诸姨妹当年轻视自己的不满之情:“相国已随麟阁贵,家风第一右丞诗。笄年解笑鸣机妇,耻见苏秦富贵时”(《夫入相寄姨妹》);一劝夫勿阻来客:“楚竹燕歌动画梁,春兰重换舞衣裳。公孙开阁招嘉客,知道浮荣不久长”(《喻夫阻客》)。三首诗皆有所本,蕴含颇多。但是,尽管她贵为宰相之妻、诰命夫人,若非《云溪友议》对其事迹的记述(卷下“窥衣帷”条),大概《全唐诗》(卷七百九十九)不会传其事略、录此三诗。

有的留下了若干片断。《全唐诗》卷七百九十五所录,多为未存完篇的诗人之作。其中,刘敬之“山近衡阳虽少雁,水连巴蜀岂无鱼”,注曰:“云安人。敬之甥雍陶,蜀川上第后,薄于亲友,不寄书,敬之让焉。陶得诗愧赧。”这些资料,全部出自《云溪友议》“冯生佞”条。任涛“露团沙鹤起,人卧钓船流”,注称:“豫章筠州人,咸通中十哲之一也,不第终”。采自《唐摭言》卷十。剧燕“只向国门安四海,不离乡井拜三公”,注为:“《赠王重荣》。蒲坂人,为诗雅正,亦十哲之一。后客王重荣,被杀”。亦出于《唐摭言》卷十。这些都是借助唐人小说中的只言片语,这些人有幸被录入《全唐诗》之类的诗歌总集,跻身于唐代诗人的行列。

唐代小说作家对诗歌的运用,其意或非全都在于保存,但通过小说使众多诗歌传世、诗人留名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二、演绎诗之本事

唐人小说不同于选录诗歌作品的专集,因此每首进入小说的诗歌,几乎都伴随着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。有的甚至只有故事而无具体的诗句。所以,唐人小说中有关诗的故事(诗本事),其数量不亚于所存诗歌的数量。它们有的侧重于诗歌、有的侧重于诗人,有的记录当代之事,有的追忆前代佚闻,拥有极大的容量。

(一)当代诗人诗作本事。下面是偏重于记述当代诗人事迹的几则片断:

致仕尚书白舍人,初至钱塘,令访牡丹花。独开元寺僧惠澄,近于京师,得此花栽。……会徐凝自富春来,未识白公,先题诗曰:“此花南地知难种,惭愧僧闲用意栽。海燕解怜频睥睨,胡蜂未识更徘徊。虚生芍药徒劳妒,羞杀玫瑰不敢开。惟有数苞红幞在,含芳只待舍人来。”白寻到寺看花,乃命徐生同醉而归。时张祜榜舟而至,甚若疏诞。然张、徐二生,未之习隐,各希首荐焉。中舍曰:“二君论文,若廉、白之斗鼠穴,胜负在于一战也。”遂试《长剑倚天外》赋、《余霞散成绮》诗。试论,解送,以凝为元,祜其次耳。……后杜舍人之守秋浦,与张生为诗酒之交,酷吟祜宫词,亦知钱塘之岁,自有是非之论。怀不平之色,为诗二首以高之,则曰:“谁人得似张公子,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又云:“如何故国三千里,虚唱词歌满六宫。”(《云溪友议》卷中)

徐凝与张祜为了竞争“解头”,进行了一场近于正式考试的诗、赋比赛。由于白居易将徐排在张之前,招致张的不满。又由于此前白居易与杜牧有些隔阂,于是杜牧便极力褒扬张祜(杜牧有专文论白居易诗,评价不高)。这则称作《钱塘论》的故事,就成了一场有名的唐代诗坛公案。

当然,诗人们并非只是相互竞争,必欲压倒对方。唐人小说中也录有不少诗人之间的友情佳话,比如李白与贺知章:

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,舍于逆旅。贺监知章闻其名,首访之。既奇其姿,复请所为文。出《蜀道难》以示之。读未竟,称叹者数四,号为“谪仙”,解金龟换酒,与倾尽醉。期不间日,由是

称誉光赫。贺又见其《乌夜曲》，叹赏苦吟曰：“此诗可以泣鬼神矣。”（《本事诗》高逸第三）

此类故事的真实性虽有可疑，但具有相当的现实基础，听起来可以使人信服。另外一些故事，则加进了很大的虚构成分：

陇西李贺，字长吉，唐郑王之孙。稚而能文，尤善乐府词句，意新语丽，当时工于词者，莫敢与贺齿，由是名闻天下，以父名晋肃，子故不得举进士。卒于太常官，年二十四。其先夫人郑氏，念其子深，及贺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，白夫人曰：“某幸得为夫人子，而夫人念某且深，故从小奉亲命，能诗书，为文章，所以然者，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，且欲大门族，上报夫人恩。岂期一日死，不得奉晨夕之养，得非恨哉？然某虽死，非死也，乃上帝命。”夫人讯其事，贺曰：“上帝，神仙之君也。近者迁都于月宫，构新宫，命曰‘白瑶’，以某业于词，故召某与文士数辈，共为《新宫记》。帝又作凝虚殿，使某辈纂乐章。今为神仙中人，甚乐。愿夫人无以为念。”既而告去。夫人寤，甚异其梦，自是哀少解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九）

李贺早有才名，科举仕宦皆无所成，又兼多病而早卒，亲人友朋定当痛之。其死后列入仙班，正可告慰人们对其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。

诸如此类的故事，还有很多：赵自勤《定命录》“马禄师”条，柳宗元《龙城录》“李太白得仙”条，李伉《独异志》“陈子昂”条，薛用弱《集异记》“刘禹锡”条，李复言《续玄怪录》“李绅”条，卢肇《逸史》“白乐天”条，皇甫枚《三水小牍》卷上“韩文公从大圣讨仇”条、卷上“元稹烹鲤得镜”条、卷下“鱼玄机答绿翘致戮”条，高彦休《阙史》卷上“杜舍人牧湖州”条、卷上“裴晋公大度”条，康輶《剧谈录》卷下“元相国谒李贺”条，尉迟枢《南楚新闻》“段成式”条，皇甫氏《原化记》“贺知章”条，何光远《鉴诫录》卷一“钱唐秀”条、卷一“贾忤旨”等等，均属记述诗人之事者。

（二）前代诗人诗歌本事。唐人小说中有不少涉及前代诗人的故事。

有记述前人游宴咏诗结集之本事者：

《兰亭》者，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书之诗序也。右军蝉联美胄，兰散名贤，雅好山水，尤善草隶。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，宦游山阴，与太原孙统承公、孙绰兴公、广汉王彬之道生、陈郡谢安石、高平郗昙重熙、太原王蕴叔仁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、徽、操之等四十一人，修祓楔之礼。挥毫制序，兴乐而书。用蚕茧纸、鼠发笔。道媚劲健，绝代所无。凡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，有重者皆构别体。就中‘之’字最多，至二十许字，悉无同者。……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八〇）

有描写与前代诗人相会情景者：

元和初，有进士陆乔者，好为歌诗，人颇称之。……一夕，风月晴莹，有扣门者，出视之，见一丈夫，衣冠甚伟，仪状秀逸。乔延入，与生谈议朗畅，出于意表。乔重之，以为人无及者。因请其名氏，曰：“我，沈约也。闻君善诗，故事候耳。”乔惊起曰：“某一贱士，不意君之见临也。愿得少留，以待谈笑。”既而命酒，约曰：“吾平生不饮酒，非阻君也。”又谓乔曰：“吾友人范仆射云，子知之乎？”乔对曰：“某常读《梁史》，熟范公之名久矣。”约曰：“吾将邀之。”乔曰：“幸甚。”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。顷之，云至，乔即拜，延坐，云谓约曰：“休文安得而至是耶？”约曰：“吾慕主人能诗，且好宾客，步月至此，遂相谈谑久之。”……。（《宣室志》卷四）

有表达敬仰前代诗人之情者：

唐牛勣，字思远，唐朝散大夫郾城令。弃官从好，精心释教，从其志者终身。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，故自称布衣公子。即侍中令河东侯炎之甥也。未弱冠，明经擢第，再选右卫骑参军。公子沉静寡言，少挺异操。河东侯器其贤，朝廷政事皆访之。公子清俭自守，德业过人，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。……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一二）

记述前代诗人事迹的小说，数量虽不及记述当世者，亦难以尽列于此。举出以上几则，当可知其大概。

从小说体类角度考察,唐代传奇、志怪小说中对诗人本事的记述略少一些,杂事小说的记述较多。其中《本事诗》、《云溪友议》等,可称为专记诗人文士事迹的小说集。要之,唐人小说对诗人、诗歌本事的演绎,介绍了诗歌产生的有关情况,揭示了诗歌的命题意旨,可以加深读者对诗歌的理解,扩大诗歌的影响,其价值是高的。

三、助益诗歌研究

唐人小说、特别是其中与诗歌相关的内容,对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、使用价值。因为正规史传中记载诗人、诗作的文字并不多,此类材料大量地存于小说之中。小说作为文献,在唐诗研究中可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。

(一)提供诗坛掌故。在唐人小说中,杂事小说占有相当的份额。它们产生的时间,贯穿唐世始终;所录内容,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刘餗《隋唐嘉话》、张鷟《朝野佥载》记述初唐事迹(偶有隋朝之事)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(起于唐高祖武德初,迄于代宗大历之末)、李肇《松窗录》(中宗迄玄宗朝事),所记兼有初、盛唐两期。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、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、郑棨《开天传信记》等,专录盛唐玄宗朝之事。多录中唐事迹者,有赵璘《因话录》、张固《幽闲鼓吹》、韦绚《刘公嘉话录》、苏鄂《杜阳杂编》、高彦休《唐阙史》等。偏重晚唐事迹者,有佚名《玉泉子》、刘崇远《金华子》、尉迟偓《中朝故事》。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,更是延及五代。这些著述中有关诗人的事迹,来自作者耳闻目睹者不少。有的作者本身就是史学家,创作态度较为严谨,所录事实的可信程度较高。例如李肇《国史补》,收录了开元至长庆100多年之间的轶事琐闻,有关李邕、崔颢、王维、李白、韦应物、李益、韩愈、元稹、白居易等人的记述,后人经常征引。又如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,详载唐末、五代及诸国杂事,包括许多中晚唐及五代时文人的事迹,诸如顾况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皮日休、聂夷中、杜荀鹤、罗隐、韦庄、和凝等人的轶事,以及文人温卷等情况,都是研究文史的好材料^[1](第12页)。传奇志怪小说中,也不乏此类著录。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一二《语资》,共有25条,所记皆南北朝隋唐名士逸闻。其中关于李白、王勃等事,经常被治唐诗者引用^[2](第733页)。《太平广记》收录唐人小说数量巨大,有关唐代诗人的奇闻轶事,多赖此书而存,其中《贡举》、《谗选》、《文章》、《才名》等类目,所录更为集中。至于范摅《云溪友议》、孟棨《本事诗》、王定保《唐摭言》等,则属于专录唐代诗人文士事迹者,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。因此,即使为了增广有关唐代诗歌的见闻、熟悉诗坛掌故,唐人小说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(二)概述诗风趋势。唐人小说中不仅大量涉及具体诗人、诗作之介绍,而且不乏针对较长时期、较大范围的有关诗坛状况、诗风特征的评述。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下“叙著名诸公”条云:“开元日,……位卑而著名者:李北海、王江宁、李馆陶、郑广文、元鲁山、萧功曹、张长史、独孤常州、杜工部、崔比部、梁补阙、韦苏州、戴容州。”所列之人,多为玄宗朝著名诗人。在“叙时文所尚”条,李肇还对元和时期的诗风及代表诗人作了概括:“元和已后,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,学苦涩于樊宗师;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;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,学浅切于白居易,学淫靡于元稹;俱名为‘元和体’。大抵天宝之风尚党,大历之风尚浮,贞元之风尚荡,元和之风尚怪也。”这段话极为有名,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,研究唐诗、尤其是中唐诗,不可不知。赵璘《因话录》卷第三“商部下”写道:“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。韩公文至高,孟长于五言,时号孟诗韩笔。……又元和以来,词翰兼奇者,有柳柳州宗元、刘尚书禹锡及杨公。刘、杨二公,词翰之外、别精篇什。又张司业籍善歌行,李贺能为新乐府,当时言歌篇者,宗此二人。李相国程、王仆射起、白少傅居易兄弟、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,言程式者,宗此五人。”同样是讨论中唐诗,赵璘主要着眼于诗歌体式,这段话可与李肇所论共读。关于晚唐诗风,《云溪友议》卷下“巢燕词”有言:“近日举场为诗清切,而鄙元和风格。……”《北梦琐言》卷七“高蟾以诗策名”也说:“进士高蟾,诗思虽清,务为奇险,意疏理寡,实风雅之罪人。……罗隐亦多怨刺,当路子弟忌之,由是渤海策名也。愚尝览《李贺歌诗》篇,慕其才逸奇险,虽然尝疑其无理,未敢言于时辈。或于奇章公(牛僧孺)集中,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若使‘稍加其

理,即奴仆命骚人可也’。是知通论合符,不相远也。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通过唐人小说的相关记述,完全能够勾勒出唐诗发展的大概。

(三)钩沉有关事实。由于记录者见闻所囿、传抄者讹误、年代久远、典籍散佚等原因,有关唐代诗人之生平、著述的记录须作考订钩沉。如初唐通俗诗人王梵志生平情况,来自于范摅《云溪友议》“蜀僧喻”、冯翊《桂苑丛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卷八二“王梵志”所载^[3](第 251-254 页)。又如宋济,《唐摭言》卷十“海叙不遇”称其为玄宗时人,《全唐诗》小传则称其为德宗时人,曾与杨衡同栖青城山。宋济的资料全都来自唐人小说,最终确定其生活于中唐德宗时期,乃是经过比较而得^[2](第 30、251 页)。唐人小说对诗人作品的收集整理,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有些不知名的诗人,并无专集,或虽有集而不传,仅靠小说偶载其诗而传名于世。前文述及的徐月英、王韞秀等人便是如此。不少小说记述了唐代诗人作品结集整理的情况,其中张固《幽闲鼓吹》有关李贺的记载,很有参考价值:“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,为之集序未成。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,召见之,托以搜访所遗。其人敬谢,且请曰:‘某尽记其所为,亦见其多点窜者,请得所葺者视之,当为改正。’李公喜,并付之,弥年绝迹。李公怒,复召诘之。其人曰:‘某与李贺中外自小同处,恨其傲忽,常思报之。所得兼旧有者,一时投于溷中矣!’李公大怒,叱出之,嗟恨良久。故贺篇什流传者少。”这段话涉及李贺诗集编辑、李诗为何存留较少两个问题,都比较可信。

(四)纠正各种外误。在与唐诗有关的记述中,谬误不实之处颇多,可以借助唐人小说予以纠正。其所涉范围,一是小说中诗歌作者姓名之误:佚名《会昌解颐录》“张立本”条,叙草场官张立本之女被自称为“高侍郎”的妖物所魅事。文中所录“高侍郎”诗一首,应当属名为“高锴”(实为小说作者所作),但今传明刊本《高常侍集》卷八有《听张立本女吟》(《全唐诗》卷二一四亦收),系明人误以“高侍郎”为高适所致^[2](第 648、649 页)。篇内载有十余首诗的《大业拾遗记》(作者佚名),《全唐诗》仅在卷七七五录其诗一首(题为《失题》。系于方棫名下,有注曰:“一作陈叔宝诗”)。除此之外,《大业拾遗记》还有炀帝诗八首、虞世南一首、吴绛仙一首、陈后主一首,这些诗笔调明净丽婉,表意淋漓尽致,属于典型的唐人风格。因而虽将列在炀帝等人名下的诗作收入《全隋诗》(见卷一、三、四),其实全部出自唐人。具体说,出自《大业拾遗记》的作者之手。二是小说人物(诗人)家庭出身之误:《云溪友议》“窥衣帷”,叙元载之妻王韞秀激励丈夫成名之事。范摅将元载妻记作王缙相公之女、王维右丞之侄,是错误的。王氏实乃玄宗朝名将王忠嗣之女。《刘宾客嘉话录》载王氏自称“四道节度使女”,与此相符,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十八、《新唐书》卷一百四十五“元载传”中均录其为王忠嗣女。三是唐代诗人姓名之误:唐世距今千年有余,诗人名字在传抄中难免笔画之误,利用小说可以加以纠正。如中晚唐诗人张祜,一作张祐(如《又玄集》)。二者显有一误。胡震亨曾对此有辨:“张祜之祐,人多作祐字者。小说,张子小名冬瓜,或以讥之,答云:‘冬瓜合出瓠子。’则张之名祜不名祐,可知矣。”^[5](卷 29)胡氏此中所言“小说”,即指严子休撰《桂苑丛谈》,引文则出自其中“张祜”条(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三八)。四是小说作品归属之误:张读《宣室志》“曹唐”,叙诗人曹唐吟得佳句,感动鬼魂,已亦因之而死事。本篇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九有录,称引自《灵怪集》。《类说》卷二一节题作《曹唐诗》,属出《宣室志》。然曹唐为唐末人,《唐诗纪事》云其“咸通中卒”,故本篇不可能为张荐作品。《类说》(卷二三)将其归于张读,是正确的^[6](第 3249 页)。

以上,是我们对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功用所作的初步梳理概括。从中不难看出,诗对于唐人小说而言,不单单是为了外在结构上的承转起合与内在蕴含方面的抒情表意,其功能作用是多方面的。对这些功用进行深入探究,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掌握诗人、诗作本身及相关情况,加深对诗人、诗作的理解。同时,对于进一步拓展小说、诗歌研究领域,也具有借鉴、启发意义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周勋初. 唐诗文献综述[A]. 唐诗大辞典[Z]. 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2] 李剑国.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[M]. 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3.
- [3] 张锡厚. 王梵志诗校辑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- [4] 岑仲勉. 唐人行第录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5] 胡震亨. 唐音癸签[M]. 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.
- [6] 李时人. 全唐五代小说[Z]. 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98.
- [7] 李 防. 太平广记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1.
- [8] 彭定求. 全唐诗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9] 牛僧孺,李复言. 玄怪录·续玄怪录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10] 孙光宪. 北梦琐言[M]. 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9.
- [11] 孙 棣. 北里志[M]. 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.
- [12] 范 摅. 云溪友议[M]. 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9.
- [13] 王定保. 唐摭言[M]. 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9.
- [14] 孟 棣. 本事诗[M]. (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)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15] 张 读. 宣室志[M]. (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本)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
- [16] 段成式. 酉阳杂俎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17] 李 肇. 国史补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18] 赵 璘. 因话录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19] 张 固. 幽闲鼓吹[M]. 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8.

(责任编辑 何良昊)

An Approach to Function of Poetry Adoption in Tang Dynasty Fiction

CUI Ji-yin

(College of Arts, Hebei Normal University, Shijiazhuang 050091, Hebei, China)

Biography: CUI Ji-yin (1957-), male, Professor, Doctor candidate, College of Arts, Hebei Normal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fiction and poetry of Tang Dynasty.

Abstract: The adoption of poems in Tang fiction refers to the phenomena of the use of poems in fiction in Tang Dynasty. The functions of the adoption are mainly as follows: to help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oems; to help record the relating stories of the poems; to help re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oetry research.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se functions cannot only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ts and the poems but also give insights to the research in fiction and poetry.

Key words: fiction of Tang Dynasty; poetry; adoption; function